

## 数字经济与社会

引文格式: 董潇珊. 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演化的内在逻辑: 基于马克思价值运动的理论视角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2): 50-60.

# 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演化的内在逻辑

## ——基于马克思价值运动的理论视角

董潇珊

**摘 要:** 数字经济发展的持续纵深推进, 既带来了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 又引发了劳动方式与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 使得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的演化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基础性问题。劳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被表征为历史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从马克思价值运动的理论视角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过程数字化、流通组织平台化以及财富积累两极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劳资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 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数字平台资本化与数字劳动新异化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分析范畴。劳资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发展镜像, 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时代价值。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要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为依据, 准确认识数字平台资本的价值运动规律及其行为特性, 切实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探索建立以合作共享为主导的劳资关系, 通过重构社会生产、流通及分配环节的主导逻辑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劳资关系; 《资本论》; 数字劳动

**作者简介:** 董潇珊,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F0-0; F24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2.006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sup>[1]</sup>。数字经济作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sup>[2]</sup>。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 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 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sup>[3]</sup>。在数字经济时代, 随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 资本运作逻辑和传统劳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 数字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更为隐蔽, 劳资结合的方式也更加复杂, 因而需要从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及其与当代社会关系的若干联系中给出时代诠释。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从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运动等层面着手,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动规律, 即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了价值, 而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获取利润。“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变化蕴涵于价值运动的全过程和各环节。”<sup>[4]</sup> 马克思通过价值运动理论深刻阐释了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的本质属性直接决定了私有制生产关系中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关系。这一过程从思想整体上展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于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劳资关系的本质和特点，进而建设和谐有序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鉴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运动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资本论》中劳资关系理论的原初要义，聚焦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和劳动的辩证关系及其未来演变趋向，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服务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 一、马克思价值运动理论中的劳资关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基点，劳资关系议题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审视与批判过程中渐进生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价值生产、价值流通、价值分配三重视角为基准构建了价值运动理论体系，并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资本价值运动的本质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5]8</sup>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内在规定了劳资关系演化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运动的逻辑体系。

在价值生产领域，劳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运动“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sup>[6]699</sup>。《资本论》第一卷《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章节充分阐释了劳资双方在生产领域的矛盾关系直接体现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剥削。一方面，马克思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sup>[5]359</sup>。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和劳动者形成了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两极分化，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占有和支配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抗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又是相互依存的，二者统一于社会生产过程之中。恩格斯说：“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sup>[7]</sup> 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发挥出劳资双方的职能。“只有在人类社会劳动的参与下，在产业活动与自然力的结合中，剩余价值才能产生。”<sup>[8]</sup> 无论是传统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还是如今的数字经济时代，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都需要依赖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劳动也需要获得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以维持生计或实现更新再造。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资本互为价值，并在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统一。正因深刻洞悉这一发展趋势，所以马克思在辩证地阐释资本和劳动对立性的同时，也试图探索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可能。

在价值流通领域，劳资关系看似是“平等”与“自由”的，实则是劳动依附于资本的不平等从属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sup>[5]714</sup> 价值流通既是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又是维系资本循环运动的价值基础。一方面，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会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劳动力商品。为了追求更多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迫使劳动者在同样的工作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而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却非常有限，“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sup>[5]681</sup>。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劳动力价值相对下降，工人在同等劳动

时间内创造了更多的价值。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会受到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工人为了维系基本的生活资料只能不停地消耗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在并不纯粹的、无休止的商品流通中不断实现着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章节中详细叙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的运动规律和资本积累过程,以及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获得剩余价值并用于资本再投资和积累的过程。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sup>[5]679</sup>。“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sup>[5]685</sup>资本家将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商品消费,另一部分则用于资本积累,其中包括了工人的生活资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对劳动的强制占有。诚如马克思所言:“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sup>[5]661</sup>在价值流通领域,看似平等的劳动力买卖背后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也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基础。

在价值分配领域,劳资关系表现为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地占有剩余价值,这种不平等的价值分配形式也成为劳资矛盾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指出,资本家在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支付给工人“工资”来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从而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sup>[5]216</sup>“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sup>[5]196</sup>在这过程中,工人不仅能生产他自身获取的“工资”那一部分的价值,同时能创造远远超越“工资”或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获取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工资”,一大部分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所以马克思说:“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sup>[5]216</sup>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各种形式的资本,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体现为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酬劳动对象化成的可除部分”<sup>[9]272</sup>,反映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凭借其生产要素所有权在分配领域瓜分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过程。马克思同时指出,劳动价值产品不能简单地划分为劳动力价值(工资)和剩余价值,因为劳动价值产品绝不是由资本家和工人共同或者相互分配的,它的分配是资本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对抗性分配,这是由资本积累的本性决定的。由此可见,在价值分配领域实现利润份额的最大化,是激励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和深层动因,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剥削关系。

## 二、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阐释“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及其广泛应用,资本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使得数字技术向数字资本转化、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异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新特点,从而使劳资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劳资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生产、异化、剥削等概念的变化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内在范畴,它们是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定体现和结果。



### （一）生产过程数字化与价值形成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传统生产资料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人的活劳动更多地被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操作系统所取代，数字化生产模式也顺势而生。马克思认为：“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sup>[5]230</sup>数字技术推动着生产过程发生数字化变革，既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质量和效率，又创造了更多的商品价值，其中也必然涉及对劳资关系的解构与重构。一方面，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变革使得社会生产的运营空间不断拓展，也导致资本剥削劳动的形式更加复杂。在智能化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可以通过“非雇佣”的形式参与社会生产，对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也更加自由。然而，数字劳动往往需要持续专注力的投入，不仅使得劳动与休闲的边界更加模糊，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劳动者的劳动负担。例如“互联网专车”的劳动用工中，平台一边宣扬着自愿加盟的平等合作理念，一边又通过绩效奖励机制激励司机服从平台调度。在以错峰奖励、接单奖励、服务分奖励等额外收入为驱动力的报酬机制下，司机不得不将生产效率和劳动强度发挥到最大化，不仅主动延长工作时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由此可见，数字平台空间中劳资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资本反而在“自愿加班”“灵活自由”的形式掩盖下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的控制程度。只要数字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数字生产能力和创造力，就会被资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一轮又一轮的数字生产中，从而被迫为资本创造出更多价值和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劳动资料的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劳动与资本的双向依赖。数字化生产系统的广泛应用催生出虚拟和实体生产体系灵活协作的新型运营模式，使“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sup>[10]</sup>。数字产品以非物质化的信息资料为生产要素和直接劳动对象，其本身蕴含着人的生产性劳动。数据、信息、知识的资源作为原材料只有经过了人的对象化劳动，才能够成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劳动产品。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数据量化，资本通过数字平台挖掘和分析用户的消费数据，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喜好、想法进行定制化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必须尊重劳动者作为消费主体的需求，而劳动者的物质生产生活也离不开资本掌握的数据生产资料。

当前，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劳动资料的投入使得生产方式的智能化程度和生产过程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也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互动协作方式不断更新。回到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原初语境，他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5]210</sup>，“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sup>[5]427</sup>。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也必然会导致劳动对象的数字化。他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中系统地分析了机器应用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一是会大幅提高生产力，引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二是机器生产将随之带来劳动者工作强度的增加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并造成传统产业的人力资源过剩以及“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sup>[5]560</sup>。在数字经济中，数字既可以作为劳动资料参与社会生产，同时也可以充当劳动对象。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的方式，也会使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知识与技能的不断积累过程中，创造价值的活劳动被对象化所占有，由此被资本所吸收并表现出劳动资料的属性。一方面，数字技术会像以往的机器工业革命一样，大幅提高社会生产

力,即使是处于最底层的劳动者也能够享受到由数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红利,从而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会引发劳动资料体系的深刻变革,一些低技能和重复性的劳动将会逐步被智能化、数字化机器所取代,行业精英和掌握数字技术的资本家的财富会不断积累,而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能劳动者将会丧失原有的就业机会,甚至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sup>[9]922</sup>。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发展。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数字资本依托于先进的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积累,对数字劳动控制和剥削的方式也潜在增强,劳资互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与转移也变得更加复杂,但劳资双方对劳动价值及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仍然不是平等的占有或等价交换。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依旧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劳动力特殊商品,实现对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从形式上看,数字经济时代劳资结合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生产和价值积累也有了相应的调整,雇佣劳动的形式更加灵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劳资矛盾的消失。生产资料数字化的发展,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剥削变得更加普遍和隐蔽,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本质在场。

## (二) 流通组织平台化与价值流通

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流通速度和流通周期的长短,对于资本循环运动的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sup>[11]142</sup>所以,出于对资本积累和价值增殖的追求,资本往往会不断压缩商品交换过程中耗费的成本,从而加快价值的实现过程。当前,“平台主导了互联网和我们的经济”<sup>[12]</sup>,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平台式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资本的周转速度得以提高,商品的价值得以强化。布若威形象地比喻道,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正如玩一个游戏产生对其规则的同意,所以在参与到资本主义迫使我们要做出的选择中也会产生对其规则、规范的同意”<sup>[13]</sup>。表面看来,平台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更像是合作而非雇佣关系,但实际上在精巧的算法管理和数据控制下劳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平台企业的生产规则。以互联网作为传输媒介的平台经济的兴起,既可能通过扩大交换范围和流通领域,展现出资本支配社会生产的权利,又可能扩大不同区域、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导致劳资关系的不稳定性逐渐提升。具体而言,一是数字技术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范围和支配权利。在数字资本积累过程中,平台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利用数字平台与数字技术优势实现对劳动者的数字霸权,又会通过隐藏雇佣关系、延长工作时间等方式强化对劳动者的控制。二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资本家实现了剩余价值剥削的最大化。数字资本凭借着对数字平台的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能快速实现资本积聚与扩张,不仅可以剥削前端生产者的剩余价值,还可以攫取后端消费者的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例如,共享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以高效整合资源和获取额外利润的方式,进一步提高商品交易效率,实现了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获取。三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方式更加隐蔽,更加不易被人察觉。资本通过智能算法“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sup>[5]306</sup>。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和技术手段实现对劳动者去技能化的控制,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迫依附于资本。在劳动者的技能控制、劳动过程的隐性监控和劳动者的依附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资矛盾表现得更加隐蔽。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sup>[11]389</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运动是价值创造和剩余价值不断积累的双重复合过程，具有价值创造与价值增殖的二重特性。在资本主义价值运动过程中，价值实现是资本的最终目的，只有将具有剩余价值的商品从生产领域投入流通领域，“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才能成功实现。数字资本主义的价值运动仍然以价值增殖为目标遵循，但又有着不同于工业时代资本价值运动的新特点。在平台化的流通组织中，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而是通过数字平台拥有更为复杂的价值流通过程。这种新的价值流通方式使得资本能够更加精细地掌握和操控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变动，从而实现更高效的价值增殖。生产组织和流通组织的平台化趋势，将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过程统摄于数字化的时空场景之中，既包含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共创”，又通过更加隐蔽但却更高效的途径为资本带来价值增殖。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平台经济在流通领域发展出多种经济业态，也创造了网约车运营、外卖配送、直播销售等多种形式的零工劳动，虽然这些非生产性劳动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却有利于加快商品价值实现的速度。平台作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和交易场所，在商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传统商品的价值实现也越来越依赖平台模式下的零工劳动。平台通过交易场所、营销推广、物流配送等服务帮助商家及平台企业占有了更多价值与剩余价值，同时将商家原本需要承担的流通费用转移给消费者，获取一定比例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双重价值。从劳动力价值实现方式来看，平台主导的劳动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分配，如工作分配、绩效管理和报酬支付等都是在平台上进行的。数字资本凭借技术垄断与平台优势，在控制劳动过程和支配劳资关系的同时通过数据驱动、算法控制、弹性劳动力市场建构等方式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也在隐性雇佣关系中直接攫取零工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加快了数字资本的积聚与扩张。概言之，数字经济时代流通组织平台化打破了传统用工模式的时空局限，推动着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劳动重新组合，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雇佣关系的新型用工关系。

由上分析可见，数字技术催生的平台经济新样态不仅没有证伪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反而从各方面证实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剩余价值占有的科学论断，印证了资本与劳动在价值流通领域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我们可以预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经济社会发展会导致平台资本与劳动之间利益关系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不断增强。一是因为即使是数字技术促使生产方式变得更加数字化，数字资本依旧会遵循传统的雇佣劳动方式榨取数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一点不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改变；二是因为数字劳动过程依然是剩余价值增殖的过程，也是数字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过程。因此，在数字经济视域下，虽然生产要素披上了“数字化”的外衣，但是劳资关系并没有脱离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其本质还是如马克思所说的“由商品向资本转化的理论进路”。

### （三）财富积累两极化与价值分配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平等的分配是资本运作的一个根本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sup>[5]47</sup>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应用推动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资本通过对核心技术和生产要素的掌握，逐渐加强了对新型数字劳动产品的垄断，导致全社会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得以重新分配。在数字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数字技术正驱动着数字劳动逐渐发生异化并呈现出不同



的表现形式,“对象化劳动”<sup>①</sup>在劳动过程中与个体劳动者的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了支配活劳动的力量,从而导致了数字红利的不平等分配。一方面,智能化数字生产驱动着大资本数字平台的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进一步挤压了小资本与劳动力的价值分配空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资本数字平台凭借着掌握数字关键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人才队伍等优势,极大地加强了对社会生产和分工的掌控力度,并强化了对数字劳动产品的占有程度。在大平台数字资本垄断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大资本与小资本、劳动力在技术和资源掌握、市场份额和影响力、资本积累和资金储备等方面的差距也逐渐拉大,而剩余价值总是趋向于流入更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平台。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引发了传统劳动方式与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劳动产品异化隐匿于非物质形态的数字产品之中,看似灵活的雇佣方式实则是劳动者深嵌于智能化生产中并任由资本操控和支配。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sup>[5]497</sup>在数字经济形态下,资本一方借助对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将分利权占为己有,在雇佣关系看似即时化、弹性化的背后其实是资本对履行社会保障义务等问题的规避。这实际上是以临时用工、灵活就业的名义侵占了劳动者作为正式员工应享受的福利待遇,劳动者应得的加班费用、社会保障等在“合理化”扣除的同时也转化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sup>[6]707</sup>,“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sup>[5]684</sup>。在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生产要素依然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摆脱或减缓劳动异化问题。相反,数字经济视域下的价值分配情况反映出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力度更深、剥削形式更隐蔽。从价值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来看,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性在不同的行业和领域之间都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例如,工程师、程序员等高技术劳动者因从事着高度复杂的技术生产劳动,维持再生产劳动力价值和教育的成本较高,所以收入报酬也远超于普通劳动者。然而,高收入的背后却是过度劳动和劳动透支的结果,劳动者一边承受着“996”式的超强度工作,一边在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模糊中随时接受着工作任务。从数据产品的分配来看,唯有资本投入才能使数据产品向数据商品转化,这种强势的资本逻辑也使得劳资关系的不稳定性逐渐提升。在数字化的劳动形态下,劳动资料获取的方式更为简单,通过搜索引擎就可以在几秒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数据的“一键获取”,表面上看似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实际上,通过网络搜索获取的信息并不是具有实然价值的数据商品,用户仅仅是实现了数据占有而无法将数据产品转化为数据商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sup>[14]</sup>。在数字资本的运作逻辑中,数字劳动者的价值分配与一般劳动无异,生产要素、劳动产品、剩余价值等依旧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数据作为主要生产要素被资本家占有,甚至被外在表征为“知识产权”,作为消费者的劳动

①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这里所说的“对象化劳动”,指劳动者以往的活劳动凝结而成的对象化劳动成果。数字技术作为以往活劳动的产物,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结合,从而成为一种对象化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

者在购买和消费数据商品过程中无形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与扩张，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依据马克思劳资关系思想可知，在劳资双方对生产要素的分配与交换过程中，在“工资”和“劳动力”看似等价交换的背后，其实是价值的不平等分配以及资本对劳动赤裸裸的剥削。从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演化的特征来看，“数字劳动异化”的现象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呈现的方式更为隐蔽，劳动者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依旧在场，在价值占有和分配中依然被迫接受着“按资分配”的强势逻辑。生产要素数字化虽然使得劳动过程发生变化，但却没有改变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价值创造的主体依然是劳动者的劳动力。因此，数字形态下的价值分配并未摆脱私有制下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原则，数字资本依托技术加强了对劳动者的控制，而数字劳动者却因为劳动强度增强和过度被剥削，逐渐陷入贫困化。

### 三、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现实启示

劳资关系理论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积累、价值剥削乃至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矛盾的重要理论维度。尽管马克思关于劳资关系的理论分析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展开的，但其内蕴的理论向度与现实指向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从价值生产、价值流通到价值分配的理论逻辑中，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劳资冲突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价值分配领域都有着突出的表现。在时代发展的现实维度上推进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化发展，对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规范市场秩序、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 （一）在生产环节践行共创逻辑，实现数字生产的交互创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劳资矛盾加剧的根源，且“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sup>[15]</sup>。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sup>[16]</sup>马克思从两个维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从生产力维度来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往往容易激化劳资矛盾，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劳资冲突，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并未改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sup>[5]743</sup>从生产关系维度来看，劳资关系是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出资本、劳动与技术的具体组织方式中人与人的关系。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又一次变革，但它并没有颠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雇佣劳动的现有形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数字成果的共创共享以及数字资源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可以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的诉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充分说明当前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确认和保护数据产权对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性。现阶段中国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我们必须明确数据的公有制属性，兼顾数据正义与数据效率原则，既要数据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建立健全以数据确权为前提的数据共享与交易制度，强化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又要将推动数据共建共享纳入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轨道，以此规避劳资双方因数据掌握和信息运用能力不对称所引发的劳资矛盾。因此，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既要重视对个人数字信息与数字知识产权的保



护,又要打破头部数字企业的技术垄断限制,高效利用数据信息释放数字技术红利,加强劳资双方的互动协作与数据共享,推动和实现“价值共创”。

### (二) 在流通环节践行共享逻辑,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

流通环节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枢纽,一切产品都必须经过交换才能进入消费领域。依据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可知,流动过程中的劳动力价值差异引发了劳动者之间内部竞争与分化,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格局也发生着深刻改变。数字平台的兴起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但也使得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变得模糊不清。集聚在数字平台上的供应商仍然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购买劳动力特殊商品,劳资关系从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纯粹市场交易关系,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剥削模式。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sup>[5]455</sup>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下,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维系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是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缓和社会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四个方面:首先,就统筹数据权益保护与数据互通互享而言,既要善用数据生产要素,构建公平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又要积极鼓励劳资双方在数字平台中主动维护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秩序,为促进劳资关系共享发展提供数字化的新型劳动空间;其次,在数字平台的规制与完善方面,要充分发挥平台的技术载体优势,依托平台的良性运转满足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内在需要,协调好用户、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再次,从平台算法治理制度的创新来看,要积极探索以人为本和多元共治的算法规制体系,警惕算法背后的资本操控,激励算法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从而有效调动劳动者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动性;最后,对于数字市场竞争的监管,要建立健全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机制,防止和规范治理资本挟持数据产生的市场垄断、无序扩张等不当行为,避免劳动者在不良竞争中陷入不稳定的被动状态。

### (三) 在分配环节践行共有逻辑,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

马克思认为:“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sup>[6]699</sup>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通过“按资分配”制度参与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分配,而工人阶级依靠出卖劳动力只能换回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工资”,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关系导致了劳资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相对而言,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决定了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财富分配的模式,体现出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建设要坚持生产资料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以数字立法加强对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首先,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供给,补齐数字经济的法治与监管短板。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完善数字经济立法和加强制度监管是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抓手,具体就是要落实到数字资产所有权确权、数字税征收、数字劳动者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上。在立法方面,要不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体系,统筹数字经济安全、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确保数字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和规范的管理秩序。其次,政府部门要加强监察执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经济权益。在具体的举措上,要依据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从属性因素的论述,合理确定数字平台与数字劳动者的权利义务,维护好数字劳动者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合理休息、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方面的权益,使参与数字经济的广大劳动者得到合理的收益分配。最后,坚持以公平分配、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完善收入再分配调控机制,形成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格局。利益分配平等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的核心内容,必须从数字经济各方主体入手协调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发挥好政府收支调节的作用,又要持续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公平公正地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 四、结语

每次回到、走进、深耕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都应密切关注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区别于以往的新变化，从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时代中的体现。《资本论》文本所指向的劳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契合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智慧延展，而其所指向的缓和劳资矛盾的实践向度也成为当代劳资关系和谐发展的着力点。在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演化的内在逻辑依旧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与劳动辩证性关系的理论进路，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时代价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数字经济视域下社会生产的具体样态正不断变化，具备数字生产能力的知识型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收入分配结构也有所改善，劳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区别，这就表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劳资关系并未发生本质的改变，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现阶段的数字技术发展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公有制基础上推进数据共享、实现数字普惠，秉持“数字技术促发展，发展成果惠人民”的发展思路，探索建立以合作共享为主导的劳资关系，引领和规范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的有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0.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04.
-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EB/OL]. (2022-12-07)[2023-10-30].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
- [4] 徐志向，罗冬霞. 数字经济与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演化探析：基于马克思价值运动理论的视角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43（5）：17-24.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8.
- [8] 陈全顺. 马克思自然力思想的理论定位与现代化出场：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考察中心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4）：55-61.
- [9]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2] 莫塞德，约翰逊. 平台垄断：主导21世纪经济的力量 [M]. 杨菲，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2.
- [13] 布若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M]. 李荣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5.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5.

[16]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J]. 党建, 2018 (5): 4-10.

## The Internal Logic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 Evolu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vement

Dong Xiaoshan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no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value prolifer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but also trigger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s and forms of labor, making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 increasingly fundamental issue in today's social and economic production. Labor-capital relation is characterized as a historical dialectical unity of opposites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arx's value movement,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latformization of circul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wealth accumul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ave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 show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its essence has not changed. The capitaliz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the new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have never gone beyond Marx's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t labor-capital rel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 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digital capitalism has once again confirmed the era value of Marx's labor-capital relation theo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value movement law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platform capital 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Marx's labor-capital relation theory,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igital workers,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labor-capital relation dominated by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and construct harmonious labor-capital relation by reconstructing the dominant logic of social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labor-capital relation; *Capital*; digital labor

(收稿日期: 2023-11-01; 责任编辑: 沈秀)